

經濟危機與階級政治： 馬克思主義的啟示

• 陳敬慈

摘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對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作出了樂觀的推斷和期許，該分析建基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在經濟上導致商業周期和危機，在政治上帶來工人階級改變生產關係的鬥爭的必然性。本文回顧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和勞工政治以及相應的思想潮流，指出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雖然為社會的變革帶來了機遇，但是向哪個方向走卻是一個政治問題，取決於階級力量和階級鬥爭。從1930年代、1970年代，再到2008年至今，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多次重大危機，雖然工人階級展開了不同程度的鬥爭，但是其結果因階級力量 and 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別而出現差異。本文認為，馬克思所示範的分析方式和揭示的歷史觀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啟示作用，但是新的歷史處境需要新的政治策略。

關鍵詞：經濟危機 馬克思 階級鬥爭 勞工政治 資本主義

2018年是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假如我們要詮釋馬克思主義對當代的重要意義，還不得不提今年也是西方經濟危機(2008)十周年，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如果說1978年東西方發生的歷史事件標誌着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政治和思想界的衰落，2008年以來的政治經濟危機又重新引起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開始了市場化的改革。其時，在工業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英國爆發了「不滿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數千名工人走上街頭抗議工黨政府。在「勞工沒有工作/工黨沒有作為」(Labour isn't

* 筆者的研究獲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項目編號：CityU140313; 11616115)，特此致謝。

working) 的口號下，英國保守黨從1979年開始了長達十八年的執政歷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和美國總統列根 (Ronald W. Reagan) 的上台宣告了新自由主義風潮的到來。在二十世紀70年代後期，社會民主主義和它的勁敵社會主義同時出現了危機。在中國，作為毛澤東時代「走資派」領袖的鄧小平在政治動盪中復出，毅然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當西方發達國家走向後工業社會的時候，中國正開始前所未有的工業化建設。同時，製造業從西方國家向後殖民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轉移，這一狀況急劇地改變了當代國際之間和國家內部的階級關係，並為2008年西方的經濟危機埋下伏筆。

2007至2008年，美國的次按危機引發了自1929年的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以來西方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影響持續至今。在中國，舉國上下則慶祝北京奧運成功舉辦，往後十年經濟迅速崛起，成為引領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2008年10月22日，當英國首相白高敦 (Gordon Brown) 首次承認英國經濟步入衰退時，被保守黨黨魁這樣揶揄：「為甚麼不承認，你的人生從沒有終止繁榮和衰退的交替？」^① 白高敦在擔任財相十年期間多次表示，在新工黨的領導下，資本主義經濟慣常的繁榮和衰退結束了。有趣的是，在1927年，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 (John M. Keynes) 也曾這樣說：「在我們有生之年，將不會再有跌市。」^② 1929年，華爾街股市暴跌，美國經濟陷入大蕭條。雖然凱恩斯錯誤估計了形勢，但他主張透過政府的公共政策消滅經濟周期的理論，成為戰後三十年的政治共識和經濟教條，直到1973至1975年爆發經濟危機和1979年戴卓爾上台為止。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二十世紀的歷史，並思考二十一世紀的未來？馬克思所期許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沒有來臨，人類更將進入威權資本主義的年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歷史觀，是否仍能為我們理解歷史發展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在這個自由主義早已聲稱歷史終結、後現代主義徹底否定宏觀論述的年代，從生產關係的分析出發的危機理論被表面化的風險社



1929年，華爾街股市暴跌，美國經濟陷入大蕭條。(資料圖片)

會學說取代，以階級關係的分析為主軸的歷史觀被繁複瑣碎的文化身份運動掩蓋。但是假如不從資本累積的邏輯和經濟周期開始說起，我們就無法洞察社會的複雜變遷，從而摸索出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所示範的分析方式和揭示的歷史觀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只是面對新的歷史處境需要新的政治策略。本文回顧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和勞工政治以及相應的學術思潮，指出經濟危機雖然為社會的變革帶來了機遇，但是向哪個方向走卻是一個政治問題，取決於階級力量和階級鬥爭。

一 經濟危機的幽靈：馬克思的危機理論

白高敦和凱恩斯一樣，都曾經努力企圖消滅資本主義經濟的商業周期，而且都天真地以為已經做到了。商業周期即繁榮和衰退相互交替，消滅商業周期的最終目的當然是要消滅衰退，避免經濟危機的出現。但是，凱恩斯和白高敦所採取的方式十分不同。凱恩斯主張擴大公共開支，白高敦則承襲戴卓爾，致力推動私人開支的增長。凱恩斯回應的是1930年代的危機，戴卓爾和白高敦回應的是1970年代和2008年的危機。就像凱恩斯主義舒緩了1930年代的危機卻累積和間接引發了1970年代的危機一樣，戴卓爾主義「處理」了1970年代的危機卻變相埋下了一場在2008年爆發的更大危機。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和周期性提供了解釋：玄機在於資本累積本身的矛盾。最先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歷史傾向的學者是恩格斯，他在1843年寫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在競爭之下，資本家要不顧市場的限制，不斷擴大生產，降低成本，最後出現生產過剩。生產過剩導致小生產商和弱勢資本家被淘汰，資本的集中化、過度和缺乏，過量工作和失業的共存，以及繁榮和衰退的交替。在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也發現就業機會的周期性波動和技術創新帶來的勞動後備軍的定期增加^③。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受「共產主義者同盟」委託起草《共產黨宣言》。作為1848年歐洲革命的綱領性文件，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帶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以及導致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這一必然結果^④：

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複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製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彷彿是一次饑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彷彿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

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着大

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佔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並沒有直接表示經濟危機帶來革命的機會，但是在1850年寫成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馬克思說道^⑤：

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還談不到甚麼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發生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來臨像新的危機的來臨一樣是不可避免的。

英國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克拉克 (Simon Clarke) 指出，馬克思預期革命終會來臨，而馬克思在分析中指出，危機和革命需要在以英國為中心的全球範圍內展開^⑥。全球資本過剩導致的經濟危機，往往首先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發生，但是這些國家卻有能力將危機轉移到資本主義的邊緣地區，並在那裏引發政治革命。以1847年的經濟危機為例，其根源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工人階級組織化最為發達的英國，出現了資本累積的過剩，但其影響卻在歐洲大陸 (特別是法國) 呈現出來。此次危機導致的最關鍵鬥爭，不是在英國的工人和僱主之間的階級鬥爭，而是在法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即金融和地主貴族與公務人員 (state dependants) 之間的鬥爭。透過這樣的機制，生產過剩的危機轉化為金融危機。歐洲的政治危機過後，黃金流入倫敦避險，世界市場進一步向英國敞開，帶來了維多利亞繁榮期 (great Victorian boom)，影響及至歐洲。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危機愈延後爆發就會愈嚴重，愈有可能對英國帶來反作用。雖然1848年的革命失敗了，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爆發下一次危機和革命更加樂觀：歐洲是政治革命的場所，社會革命則將在英國發生^⑦。

問題是，雖然經濟危機和政治革命不斷，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和預計的、發生在矛盾重重的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社會革命卻未有出現。例如1998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雖然根本的原因是來自歐美和日本的全球資本過剩，但其後果卻是在印尼和韓國等國家出現民主和勞工運動^⑧。同樣地，2008年的經濟危機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地帶如北非等阿拉伯地區引發了政治革命；在危機的發源地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如英美雖然也出現了政治上的動盪和兩極化，但是社會革命仍然遙不可及。

二十世紀在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有廣泛影響的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在2012年逝世，他在最後一本著述《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How to Change the World: Marx and Marxism 1840-2011) 中評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和影響，並總結說：「經濟和政治的自由主義，無論是各自為政或是以組合的方式，都無法為

二十一世紀的問題提供答案。我們再次到了認真思考馬克思的時候了。」^⑨對於《共產黨宣言》中無產階級革命的論斷，霍布斯邦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結果」，「但不一定是唯一可能的結果」^⑩。

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之後，美國五位左翼政治和社會學者合著了一本題為《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的書。在書中，世界體系理論創始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資本主義的當前危機是結構性的，「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體系由於過度偏離均衡狀態已經無法再維持下去，也無法再讓資產階級無止境地累積資本了」^⑪。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哈維(David Harvey)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一書中重新詮釋了資本在累積和流通過程中的內在衝突和危機，指出這些危機至少有一部分是致命的，例如對自然和人性的破壞。和沃勒斯坦一樣，他也認為資本透過地理擴展維持利潤率，已經愈來愈不可持續^⑫。

雖然來自不同的學科，但是這些從新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思索人類未來的著作有很大的共通點：首先，突出對目前政治和經濟危機的焦慮感，認為資本主義處於空前的危機中，而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還未能挑戰和超越資本主義；其次，儘管像哈維談到了勞動市場和勞動過程，霍布斯邦也談到勞工運動^⑬，但是這些著作都沒有將當代的勞工運動放在一個核心的位置去省察。

哈維在研究方法上認為，只有資本累積的矛盾才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父權制度和種族區分等社會壓迫是先於資本主義而存在的，所以他要將資本的流通和累積視為一個「封閉系統」，與其他事物區隔開來。在社會變革策略上，他又主張「革命人道主義」，即不同的進步社會運動(宗教、環境、都市等)在「反資本主義」旗幟下聯合^⑭，勞工運動僅是眾多運動中的一種，沒有優先性。霍布斯邦則對新社會運動不表好感，他說：「在左派古老的意識形態分裂而沒落期間，也興起了某些基進或左翼的思想，但主要是建立在中產階級的基礎上……勞工運動想像的是社會轉型，而他們代表的是抗議而不是願景。」^⑮至今工人階級為何無法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許的，形成一種能挑戰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或者說，它在何種條件下才能成為社會變革更加有效的力量？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議題，也是本文分析的重點。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對歷史有所梳理。

二 從「自在」到「自為」：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

上述對工業革命的批判性解釋，更早出現在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⑯。霍布斯邦稱，恩格斯的主要貢獻是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背景下考察工人階級的形成，並將勞工運動視作工人對於剝削進行反抗的必然結果^⑰。恩格斯在該書1892年版的序言中承認這本書並不是一部成熟的著作，而只是一個初步的探索^⑱。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更新了對英國工人

階級狀況的描述：「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是為了使用它，勞動力被使用的部分是勞動本身，是驅使出賣勞動力的人去工作。這裏，勞動和勞動力概念的分離是分析勞動過程理論的開始。」^{①9}在現代工廠的生產過程中，原料需要通過機器進行加工；工人的技能被包括在機器生產過程中，因此被去技術化。儘管機器是勞動過程的輔助者，並且可以替代一部分的勞動力，但是資本家還是在使用機器的成本小於使用勞動力的時候，才會用機器代替勞動力。因此，資本家也採用另外的策略來減少生產成本，首先是僱用婦女和童工來降低工資水平；其次是通過提高勞動強度或延長工作時間來增加勞動者的生產任務。儘管現代工業是專制的，但是馬克思並不認為工人是單方面的受害者。工人將學會日常的抵抗並形成一個整體性的工人階級，最終出現社會主義革命。然而，與機器做鬥爭和與資本家的生產模式做鬥爭，在意識上還是有一個明顯區別的。這也就開啟了在「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轉化問題上的爭論，這是歷代馬克思主義者其中一大爭論焦點。

馬克思手稿含義的不確定性和手稿出版的不完整也導致人們對於馬克思著作的理解存在很多爭議。爭論的焦點之一便是自覺的「自為階級」與結構性的「自在階級」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寫到^{②0}：

經濟狀況已經將人民大眾轉化成了工人。資本家的聯合使得工人有了共同的處境和利益。工人因此已經成為一個反對資本家的階級，這時候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為一個自為階級。在我們所舉出的一些鬥爭階段中，工人聯合在一起，組成了一個自為階級，並維護自身的階級利益。階級之間的鬥爭就是政治鬥爭。

在《資本論》第一卷和《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都曾預測：通過工人的政治鬥爭，資本主義必然會被社會主義所取代。根據他的敘述，資本主義生產的剝削會使得工人為了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和工資而鬥爭，而在鬥爭中形成的意識會促成勞工組織的出現，使工人聯合起來為自身的階級利益進行政治鬥爭^{②1}。可見經濟危機的來臨為革命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機會。然而，在馬克思逝世之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似乎顯示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或者社會革命並不必然在結構上嵌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對於通往社會主義之路的不同解讀，也使得馬克思的繼承者分化成兩派：一派希望實現以議會為基礎的社會民主，另一派則希望透過革命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持決定論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唯意志論的列寧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革命中結構與行動的關係的論辯，是關於這一問題的經典爭論。決定論者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最終會去除工人的虛假意識，並且在政治行動中揭示其客觀的共同利益。唯意志論者則相信，如果沒有知識份子的教育，工人自身是不可能自然地發展出通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意識的^{②2}。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暗示，歷史的經驗會加強工人的政治意識，即「階級主體」。這「需要時間和經驗來使工人明白反對機器和反對僱用他們的資本家的區別。他們應該反對的是資本家所採用的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工具」^{②3}。

如很多勞工研究和勞工運動實踐者所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許的工人的國際主義精神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就已經達到了頂峰²⁹。然而德國社會民主黨支持戰爭，導致了代表國際工人運動的第二國際的分裂和瓦解。

三 社會民主和納粹：兩種對危機的回應

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僱傭模式、福利制度，以及與之相對應的階級鬥爭模式，都圍繞着對經濟危機的恐懼這一命題展開。1920年代，作為現代工業象徵的美國福特汽車工廠 (Ford Motor Company) 改進生產技術，以倍數提高工人的工資，希望讓工人有能力購買自己生產的汽車。福特 (Henry Ford) 是資本家，而不是慈善家，後來被稱為福特主義 (Fordism) 的這種經營模式就是為了避免結構性的經濟危機。不過，數年以後，經濟大蕭條就來臨了。如果只有福特車廠和少數工廠提高工資，而其他工廠不願意或者不可能提高工資，那麼大眾消費就不會存在，福特汽車同樣可能賣不出。還有，技術改良和工資增加的另一面是人手需求減少，會導致失業率增加和失業群體消費力下跌。可見，福特想像的大眾消費社會的來臨需要其他社會政治條件的配合。

1929年的大蕭條之後，歐美各地不少銀行、商店、工廠紛紛倒閉，工人在飢餓的驅使下走上街頭。在倫敦，工人高舉這樣的標語：「不組織起來，就餓死！」(Organise or Starve!) 而在蘇聯，斯大林正大力推動國營經濟的工業化和機械化，一些美國的技術工人竟然移民到蘇聯去。不用說，不管是甚麼形式的共產主義思想，都成為在飢餓中的西方工人的另類選擇。面對工人的鬥爭和共產主義的威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興起兩種回應：以美國羅斯福新政 (The New Deal) 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和以德國希特勒 (Adolf Hitler) 為代表的納粹主義。新政和納粹都企圖拯救資本主義，儘管有種種不同措施，在宏觀經濟上卻有相通之處——強調國家和政府的積極干預角色。

事實上，英美的傳統一脈相承，英國作為全球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自由經濟的信條根深蒂固；德國和意大利在十九世紀後期才立國，建國運動和工業化一起進行，政府一開始就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積極角色，例如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主張的國家福利，就是現代福利制度的起源。因此，凱恩斯的經濟學說未在英美流行之前，先在有保守傳統的德意兩國受到重視。就像新政受美國工人所歡迎一樣，納粹及其聲稱的「國家社會主義」在德國傳統工人階級中也得到支持。但是人道主義的社會民主和種族主義的納粹有根本性的不同，彼此的競爭最終演變成世界大戰，最後由社會民主主義取得了勝利。

1930年代工人走上街頭鬥爭，1940年代男性在前線為國家奮戰，女性被動員到兵工廠為國家效力——資本和國家需要他們的合作。這個年代的勞工運動距離馬克思想像的「國際工人聯合起來」還很遙遠。事實上，很多官僚主義的工會和工人的經濟鬥爭目光很狹窄，只看自身利益，充滿種族主義和性

別主義。但是也不可否認，為了取得他們的合作，資本和國家做出了利益上的妥協。

自二十世紀20年代以後，左翼的知識份子不是屈從於蘇聯的斯大林主義而過份強調工人階級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急於為蘇聯社會主義中出現的腐敗問題和為甚麼革命沒有如馬克思著作中所期望的那樣席捲全球，提供哲學性的解釋²⁵。對後來影響深遠的包括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霸權理論，他指出階級統治並不僅僅是靠強制性的政治社會 (國家機器)，還需要公民社會以軟性的手段形成文化霸權，令工人自願地接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²⁶。

四 三十年的黃金時期 (1945-1975)：社會民主的勝利

凱恩斯主義全面壟斷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福特的構想得到落實是二戰結束以後的事。戰爭的創傷和蘇聯勢力在戰後擴展帶來的威脅，為國家內部和國際之間的妥協提供了政治條件；在經濟上，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累積了大量財富的美國，透過馬歇爾計劃 (Marshall Plan) 資助歐洲重建，為新的經濟繁榮創造了物質條件。因此，在1945年後的歐美日，社會民主的政策路線成為左右翼之間的政治共識。政府增加公共開支，福利國家制度確立，以集體談判為基礎的勞工權益被鞏固，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大眾消費。資本主義隨之步入大約三十年的黃金時期，一直到1973至1975年為止。

凱恩斯主義的精髓在於「需求管理」。在經濟衰退時，政府透過舉債，擴大公共開支，增加就業機會；在經濟過熱時，通過加稅和減少公共開支來壓抑通脹。在這段時期，西方國家的工會組織率增加，組織化的工人透過集體談判和罷工抗爭取得穩定的工資增長；貧富懸殊在減少，工資在國民生產總值 (GDP) 中所佔的比例有所提高。凡此種種，作為戰後三十多年西方資本主義累積模式的基本特徵，反映和強化了西方組織化的工人的鬥爭，但是這種新的資本累積策略沒有為社會帶來長治久安。就像凱恩斯的很多批評者提出的那樣，政府在經濟衰退時增加開支容易，在經濟過熱時減少開支困難——經濟制度不能脫離政治現實。從1960年代中開始，歐美工人的罷工浪潮和工資水平不斷提高，令通脹高企，資本的利潤率下跌。1973年，石油價格上升引發股災，經濟衰退加劇，導致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出現政治危機，階級衝突加深，凱恩斯主義三十年的經濟神話由此結束。社會民主主義作為資本累積的政治安排出現了危機，其中一個主要的動力來自組織化的工人階級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和生活水平的鬥爭。左翼知識份子曾經有推動社會民主主義向民主社會主義過渡的希冀，但是隨着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黨提出的替代性方案的失敗²⁷和組織化的工人在政治鬥爭中的失利，代表資本利益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取得了勝利。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對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的展望，或許是低估了資本和國家轉嫁危機、管理危機和改變資本累積策略的能力，包括二戰之後福特主義和福利國家的廣泛推行；而凱恩斯及其政策支持者抱有的

樂觀主義，其問題在於他們沒有將經濟問題放進階級鬥爭的脈絡中，看不到國家公共政策既影響階級鬥爭，又受階級鬥爭所限制^⑳。

在這段時期，高等教育的普及、學生運動的興起和工人的抗爭浪潮令馬克思主義在主流學術中產生了影響，引發了研究工人階級政治的廣泛興趣。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 (Edward P. Thompson) 在 1963 年出版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這部影響深遠的著作。不同於傳統工人階級研究專注於工會和工人政黨的角色，他將注意力投向了工人的文化、社會生活和抗爭歷史在工人階級形成方面的作用。他不同意階級是由生產方式中的地位所決定的結構或分類，認為階級是受傳統、價值系統、信念和組織模式影響的歷史現象，表現為具體情境下的階級鬥爭。對湯普森來說，階級是有「主體性」或「階級意識」的「自為階級」，而不是剛性結構中的「自在階級」^㉑。霍布斯邦借鑒了湯普森的方法論，也同樣以「工人階級的形成」為名研究英國的階級形成。但是他更重視工人階級組織的作用，不同意湯普森關於在 1930 年代已經形成了工人階級的論斷，而認為「自為階級」要到十九世紀晚期工業無產階級組織建立起來後才得以形成^㉒。

1974 年，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出版了《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一書，引發了學術圈很長時間的爭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於現代工廠體制的勞動過程進行過分析，布雷弗曼將這種分析擴展到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他認為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導致工人去技術化的影響，已經從製造業波及到新的職位，比如文員和零售業從業者^㉓。這種結構性和簡單化的去技術化觀點受到了很多批評，其中最有力的批評來自葛蘭西學派的英國社會學家布洛維 (Michael Burawoy)，他認為布雷弗曼忽略了工人的「主體性」：如果不考察工作中的主觀成份，可以說就沒有辦法理解資本主義的勞動控制。布洛維提出了「製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 的概念來解釋管理者和工人的和平共處是建立在「認同」的基礎之上^㉔；在比較不同政體中的勞動過程後，他也引入了「生產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的概念來說明國家在形塑工作場所的關係中所起的作用^㉕。

五 全球化下的三十年 (1979-2008)：新自由主義的霸權

資本累積的邏輯注定了它是一個地理上不斷擴展的過程，它要不斷降低成本，就要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去尋找更便宜的土地、原料和勞動力；此外，要完成利潤的攝取，就要不斷去尋找和創造市場。《共產黨宣言》做了這樣的描述和預測^㉖：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

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

從1979到2008年，又是另外一個三十年，這段時期被稱為全球化的時代。回到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累積的邏輯，全球化並不是新現象，而是一個未完成的歷史過程。不過，比起之前的任何年代，資本主義在這段時期滲透到更加廣泛的地理空間。但是，這一地理上的表徵還無法恰當地說明生產和消費模式，以及僱傭模式在這段時期的內在變化。在新自由主義霸權之下，資本累積呈現出兩個新特徵：

第一，生產和消費核心的地理分化。在這三十年間，世界工業生產的主要基地轉移到了低工資、缺乏組織化的工人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消費活動的核心卻依然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就是說，只有西方的工人階級有能力消費，資本累積的過程才得以完成。但這裏出現了第一個矛盾：西方的工人階級或消費者如何有經濟能力消費？絕大部分的跨國企業來自歐美日，它們在全球生產鏈的運作中賺取巨額利潤，也聘用了大量的運輸、物流、零售、廣告、行政、文職等從業人員。此外，金融市場和地產市場成為新的投資亮點。英國是受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較深的國家；在三十年間，英國龐大的地理變遷之一是倫敦金融城的高度繁榮和重工業基地伯明翰的衰落，以及以大學為核心的城鎮地產業的蓬勃發展^⑤。金融業的繁榮對英國來說非常重要，它產生了一支以佣金為收入的專業隊伍，也創造了各式各樣的投資工具，令證券市場成為一個和生產沒有必然關係的賭場。除了金融業外，教育、地產和旅遊業也成為英國主要的經濟支柱，並透過經濟學理論所謂的漏斗效應，創造更多不穩定的就業機會。儘管一般工人的薪金水平不高，但是來自中國等地的消費品價格也相對便宜，工資上升的壓力相對減少。

第二，僱傭模式和工資制度的變化。在這三十年間，長工變成合約工、臨時工、外判工；集體合同變成個人合同；以集體談判調整工資，變成按個人工作表現調整工資，成為一種世界性趨勢。勞動力市場彈性化，工人集體被瓦解，勞動成本減少，但也產生了第二個矛盾：工作的不穩定意味着工人消費信心和消費能力的下降，對完成資本累積帶來困難。比如說，繁榮的股市對倫敦金融城的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很重要，但對一般工人家庭並不一定有意義。戴卓爾政府在1980年代從出售公屋開始，推動房屋的私營化和市場化；新工黨在1997年執政後繼續推行高樓價政策，十年間樓市上升了至少五倍。雖然工人家庭不一定有能力支付昂貴的樓價，銀行卻很樂意批出貸款（信用卡在鼓勵消費中也起了同樣的作用），政府也在背後大力鼓勵。儘管人們的工作並不十分穩定，但是透過借貸，消費市場仍然很活躍，經濟長期繁榮的「風光」也滿足了貝理雅（Tony Blair）、白高敦等新工黨領袖維持執政的需要。

上述的資本累積模式為處於資本主義核心位置的英美帶來了三十年的表面繁榮，而日本和歐洲的情況則稍有不同，因為它們的資本累積策略也有一定差異，例如德國重工業的比例和工資談判機制都要比英美重要。然而，英美的資本累積策略在2007至2008年出現了局限，和三十年前一樣隨着通脹和石油價格的上升而凸顯出來，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於資本累積策略的內在矛盾。為了壓抑通脹，就必須加息，這也必然增加住房的按揭供款。這樣，到了一般工人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的生活開支（包括住房的按揭供款）時，次按危機出現了，銀行的財政問題接踵而來；股市下跌，銀行金融業最先出現裁員。人們對市場的信心一旦動搖，消費和投資的意欲自然減少，同時也帶來商店和工廠倒閉潮。這就是經濟危機的簡單邏輯。

克拉克採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表示意識形態是生產模式和階級鬥爭狀況這些社會結構的反映，作為一種潮流的理論轉向，從來都不是知識份子的單方面想像，而是植根於具體的物質和政治背景之中^⑥。這段時期西方勞工運動的危機也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在1979年以來的勞工研究文獻中，隨處可見「工作場所的集體主義和工人階級身份認同正在衰退」的論斷^⑦；種族、民族、性別和宗教都成了分化工人階級、阻礙工人階級集體行動的因素^⑧。受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影響的學者分別攻擊馬克思主義者的階級中心論。前者在研究勞動過程時認為「主體性」是和權力相聯繫的概念，批評馬克思主義將結構與行動對立起來進行社會分析，並拒絕「階級」，將「身份認同」作為建構「主體性」的基礎^⑨。後者在勞工歷史的領域，主張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在工業化國家階級政治的產生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例如英國歷史學家鍾斯（Gareth S. Jones）認為工人在英國憲章運動中的激進行動不是對社會和經濟不滿的結果，而是政治話語的產物^⑩；另一英國歷史學家喬伊斯（Patrick Joyce）持同樣的視角，挑戰了工人階級形成的理論，並認為是「人民」而不是「階級」在推動着英國工人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行動^⑪。簡言之，語言和話語，或者說文化和意識形態，代替了生產中的社會關係，成為分析勞工政治的出發點。

在這樣的氛圍下，法國左翼知識份子高茲（André Gorz）宣布「告別工人階級」。他認為世界已經從根本上進入了一個「後工業社會」，產生工人階級的社會基礎也消失了^⑫。政治理論家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慕芙（Chantal Mouffe）進一步認為，尋找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⑬。簡言之，工人階級已經喪失了相對於其他身份認同的中心性和優先性；階級政治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並被身份認同政治所取代。

六 2008年至今：威權資本主義中國的崛起

面對西方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漸趨低落，1990年代開始，新興工業化國家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勞工研究的新題材。在英國，社會學者開始了「新國際勞工研究」，將研究視角投向發展中國家的新工人階級及其鬥爭經驗^⑭。

他們指出工人階級並沒有解體，而是在新興工業化國家重生了。不同於傳統的左翼觀點，作為「新國際勞工研究」這一概念的首位宣導者，南非裔英國社會學家科恩 (Robin Cohen) 將農民工和城市工人放在同等的地位上，並認為無產階級化的過程已經延伸到鄉村，工人階級的規模正在擴大^{④⑤}。和科恩一樣受世界體系理論影響並傾向馬克思主義的美國學者西爾弗 (Beverly J. Silver)，在其力作《勞工的力量：1870年後的工人運動和全球化》(*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中指出：「當勞工的力量隨着資本的遷移而被削弱，新的工人階級也在資本青睞的地區 (in the favored new sites of investment) 誕生並壯大起來。」^{④⑥}

相對於韓國、巴西、南非等國家，新國際勞工研究學者對中國的重視始於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這與國際和中國內部的社會經濟轉變有關。儘管在1949到1978年這三十年間，城市工人被視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前鋒隊，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後，階級的話語迅速消失^{④⑦}。與此同時，由數量眾多的農民工組成的新工人階級正處於孕育誕生的原始階段^{④⑧}。2008年西方的經濟危機為中國帶來了影響，中國在2009年的出口總額比2008年減少了16%。首先在沿海地區出現的工廠倒閉潮，導致很多工人被迫回鄉，圍繞欠薪和賠償問題的勞資衝突層出不窮。政府很快作出回應，例如在東莞和深圳等地出現少有的現象：地方政府直接向抗議的工人支付部分賠償。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採納了類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大幅增加公共開支。時任總理溫家寶在2008年11月宣布投入4兆人民幣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工業升級、社會福利、農村發展、環境、教育和文化等。這些措施抵消了出口減少對中國經濟的影響，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為8.7%，比政府設定的目標8%更高；2010年更恢復到10.3%^{④⑨}。

自2004年以來，中國各地不斷升級的罷工事件也令各級政府採取了措施，改善工人的待遇和保障。首先是落實和提高最低工資，以深圳為例(特區外)，2004年的最低工資是每月480元(人民幣)，2011年提高到1,100元，2018年則為2,130元；其次是推出多部保障勞工權利的法律，例如2008年生效的《勞動合同法》和2011年生效的《社會保險法》。2010年6月發生在廣東佛山南海本田汽車零件廠的罷工事件，引起了學術界和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該工廠的工人不但要求大幅加薪800元，更要求民主改選工會，最後取得成功，也帶動全國各地多家汽車工廠的工人提出類似要求，新聞記者、勞工學者和勞工非政府組織(勞工NGO)也為工人提供了幫助和作出聲援^{⑤⑩}。

西爾弗在《勞工的力量》一書中指出，面對工人的抗爭和勞動成本的增加帶來的危機，資本會採取幾個策略：一是空間上調整，將生產工序轉移到勞動力更為廉價的國家或地區；二是技術/組織上的調整，改變生產組織和引進能降低勞動力成本的技術；三是產品上調整，投放資源爭取進入具有更高附加價值的生產領域；四是金融上調整，資本從生產和流通的領域轉移出來，進入金融和投機的領域。西爾弗的分析在2010年以來的中國得到很大程度上上的驗證，例如電子業的巨頭企業富士康面對深圳等沿海城市工資上升的壓力，先是在鄭州、成都等地建立新的工廠，後又宣布要用機械人代替勞動力^{⑤⑪}。

作為「世界工廠」的珠江三角洲，廣東省和各市政府大力推動產業升級，有計劃地將低端工廠轉移到勞動力和環境成本較低的地區；深圳和廣州等大型都市則集中發展金融、地產、技術研發、專業服務等高端產業。在中央層面，政府提出要從工業大國轉化為工業強國的宏大計劃；在國際層面，東南亞成為全球工廠新的生產基地，非洲加快成為中國的能源基地和市場，而中國政府的「一帶一路」計劃，積極地為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剩餘資本提供新的出路。和1970年代一樣，也如《勞工的力量》和《共產黨宣言》所描述，全球資本仍然透過地理擴張和降低勞動成本來化解當前的經濟危機。

假如我們採納前述湯普森的觀點，將階級形成理解為圍繞階級關係的歷史過程，那麼一個數目最為龐大的新工人階級在全球化下的中國則處於再形成的過程之中⁶⁰；而且如上所述，工人的抗爭也有效地改善了工資和工作條件。然而到了2012年，情況有所轉變：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國家採取了新的策略，回應開始放緩的經濟增長和日益緊張的勞資關係。例如最低工資在部分地區的增速放緩，但更明顯的是政治壓力的增加，如對工人的罷工抗議採取高壓手段，包括刑事拘留罷工領袖等；到了2015年12月，更有七名勞工NGO的工作人員被突然拘捕，其中五人其後被刑事檢控。他們之中很多是工人出身的積極份子，透過成立或者參與NGO，協助其他工人組織多次重要的罷工和抗議事件⁶¹。此後，珠三角地區的勞工運動進入了低潮。另一方面，透過成立社區和企業工會，共青團、黨委支部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等黨政機構愈來愈深入地介入到勞資關係中。

省察中國工人階級目前的狀況，還遠遠未能形成一種可以稱為「自為階級」的政治力量，這和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因素息息相關，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觀察：

第一，國家與勞工之間的關係。路徑依賴理論認為後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依賴國家和社會結構、歷史背景和文化習俗，由路徑依賴理論發展而來的新制度分析，將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改革視為國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互動的過程；研究者認為社會主義國家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路徑受到各自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傳統所影響⁶²。美國社會學家斯塔克 (David C. Stark) 和倪志偉這樣說：「國家社會主義代表一種獨特的社會形態，並且有其自身的邏輯和發展動態。」⁶³相似地，在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模型的研究中，美國政治學者哈格德 (Stephan M. Haggard) 認為台灣和韓國等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威權主義遺產和「國家與企業」(state-business) 聯盟，阻止了當地勞工和學生像拉丁美洲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那樣成為反對勢力⁶⁴。中國既是後社會主義國家，又是東亞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有着深厚的政治威權主義傳統；強大的國家機器在壓制工人抗爭和組織化的努力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經濟增長和工人階級的主觀經驗。全球的政治經濟形勢急劇變化，並對中國的生產體制帶來影響，中國新工人階級在這背景下的策略與回應也在不斷變化，並形塑着他們建立主體性的過程。有一點很重要，雖然經濟和工資的增長已經有所放緩，但目前失業率偏低，且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和工資增長較快的地區。由於中國的新工人大部分是來自農村的農民工，他

們的生活處境也受家鄉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影響。近年來，政府強調「美麗鄉村」的建設，大力在農村扶貧，從而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改善了部分工人的處境。政府打壓事件令勞工運動活躍份子的不滿和社會意識都在加強，但是工人很大程度上還是「認同」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因此很多新工人都分享了改革開放以來生活品質不斷有改善這一感受。

第三，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的關係。雖然也有部分學者、學生和律師近年來參與支援勞工權益的運動，但是勞工NGO自1990年代以來在工人的教育和組織上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勞工NGO存在一些缺陷，它在南中國興起的原因是得益於西方消費者運動和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大部分機構都十分依賴海外的基金支援。一方面，這些基金會帶着不同的目的支援不同的勞工項目；另一方面，不同的機構因爭取資源而出現彼此間的競爭，並帶來不利工人團結的後果^⑤。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透過控制這些機構的資金來源從而收窄它們的生存空間，例如2017年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訂立的，旨在限制勞工NGO和境外支持者之間的聯繫。此外，和1920年代的上海和1980年代的韓國不同，知識份子的左翼傳統沒有形成氣候^⑥。當然這和政治空間有關，但是在知識份子中，親西方的自由民主派和崇拜毛澤東的左派之間的分化和爭議，也削弱了本來就微弱的力量。

我們不能簡單地以中國的階級和勞工政治狀況來代表迅速崛起的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情況。但是以中國為例，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國家內部，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化因素互相形塑工人鬥爭的不同過程和結果：中國威權主義下強大國家機器的存在、經濟持續增長帶來的生活改善，以及民主左翼力量的缺乏等不同因素互相配合，或許能幫助解釋為何2008年以來中國的國有資本和部分民營資本迅速崛起，作為政治力量的勞工運動卻沒有形成。在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國家，特別是2008年經濟危機的發源地英國和美國，在新自由主義敗退的背景下，階級鬥爭激化，在政治上催生了兩種新的方案：一種是以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和脫歐運動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另一種是以前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和英國工黨黨魁柯賓 (Jeremy B. Corbyn) 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並以右翼民粹主義取得了暫時的勝利。

七 總結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前後的著作，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導致商業周期和經濟危機，以及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推斷和期許。然而，從1929、1973年再到2008年，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出現了多次經濟危機，雖然工人階級展開了不同程度的鬥爭，但是其結果因階級力量 and 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別而出現差異。

1930年代，歐美國家催生了社會民主主義和納粹主義兩種對經濟危機和勞工運動的回應。這兩種方案雖有極大的不同，但也有共通之處，那就是對國家角色的重新重視。二戰之後，社會民主主義取得了勝利，但資本主義下的社會民主主義只帶來大約三十年的繁榮和穩定；1970年代之後，新的經濟危機和新的社會鬥爭催生了新的處理方案。社會民主主義曾經是左翼政黨的一種方案，卻無法取得政治上的勝利；戴卓爾和列根引領的新自由主義方案獲得成功，標誌着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失敗。同樣地，新自由主義方案也只有三十年的壟斷地位，其惡果不斷彰顯，並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破產。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之下，西方工人階級的力量被削弱，加上198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傳統受到文化中心主義思想流派的衝擊，令民主社會主義未能成為一種政治上的主流選項；儘管在法國、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旗幟的左翼群眾運動已經開始，並且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歷史、文化和政治因素，特別是威權主義傳統和強大國家機器的存在，以及經濟較快增長的客觀條件，都令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沒有形成。在這樣的歷史處境下，以美國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和以中國為代表的威權資本主義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這兩個方案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並且正在加強競爭。從1960年代開始興起的以身份認同政治為標誌的社會運動，包括近年興起的各種本土運動，相信需要回到全球政治經濟的大框架中，才能找到坐標和出路。

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經濟危機為社會的變革帶來了機遇，但是他們所期許的、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在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發生的社會革命，至今未有成功實現。經濟危機之後向哪個方向走是一個政治問題，取決於階級力量和階級鬥爭。作為《共產黨宣言》起草人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推動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為該年代的勞工運動提供了政治經濟分析和策略方案。顯然，馬克思所示範的分析方式和揭示的歷史觀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啟示作用，例如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和必然性、全球資本主義的地理擴張傾向、階級鬥爭對政治及意識形態的形塑，與及反過來，政治及意識形態對階級鬥爭的限制。但是新的歷史處境需要新的政治策略，這是馬克思的文本無法直接告訴我們的。在歐美興起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能否發展為取代新自由主義並對抗右翼民粹主義和威權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政治運動？這是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一個至關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有批評指出，歐美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也有很強的民粹主義傾向，其政策主張仍然離不開1970年代已經失敗的社會民主方案。霍布斯邦在評論《共產黨宣言》時指出，雖然社會主義並不一定會來臨，但《共產黨宣言》在資本主義如旭日東升時提出了其必將終結的遠景，已經是重要的力量^⑩。同樣地，當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意義在於，在威權資本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強勢崛起時，它展示了改造資本主義的想像和途徑。但它在組織模式和政治路線上的缺陷，也帶着這個年代的特徵，即組織化工人階級的積弱和左翼運動的衰敗。當然，事態仍在發展中，例如英美兩國最近都出現了大規模的教師大罷

工，以爭取作為勞動者的權益；而這兩個國家的年輕一代，則較大比例地形成了左傾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工人階級，不是一種身份認同，而是包括了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作為資本對立面的一切勞動者，以教師為代表的中產勞動者正是當代工人階級政治的核心部分。假如工人階級的鬥爭能夠復興並帶領其他社會運動，那麼哈維（主張不同的社會運動聯合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和霍布斯邦（質疑中產階級帶領的新社會運動推動社會轉型的可能性）的歧見或許就能得到疏解。

註釋

① “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Live”, *The Guardian*, 22 October 2008, 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blog/2008/oct/22/pmq-houseofcommons.

② “False Hope: Famous Quote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Fox News*, 26 October 2009, www.foxnews.com/story/2009/10/26/false-hope-famous-quotes-during-great-depression.html.

③ Simon Clarke, “The Globalisation of Capital,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Capital & Class*, no. 75 (Autumn 2001): 94; *Marx’s Theory of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1994).

④⑤ 馬克思 (Karl Marx)、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共產黨宣言》，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版，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406、412-13；404。

⑥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頁114。

⑦ 隨着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在二十世紀由英國變為美國，今天我們或許需要理解為以美國或者英美為中心。

⑦⑧ Simon Clarke, “The Globalisation of Capital,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99-100; 100-101.

⑨⑩⑪⑫ 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著，林宏濤、黃煜文譯：《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台北：麥田出版，2014），頁451；138；449；131-32。

⑬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等著，徐曦白譯：《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34-35。

⑭ 哈維 (David Harvey) 著，許瑞宋譯：《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台北：聯經出版，2016）。

⑮ 霍布斯邦說：「關係馬克思主義歷史的一系列研究，似乎應該有一篇文章探討工人階級的組織性運動才合適。」參見霍布斯邦：《如何改變世界》，頁433。

⑯ 哈維：《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頁18-19、301-18。也可參見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is This Tim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eetings (Atlanta, 16 August 2010), 22-25.

⑰ Frederick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Chicago, IL: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69).

⑱ Eric Hobsbawm,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8), 13-14.

⑲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英國版序言〉，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315-16。

- ⑲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trans.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ed. Frederick Enge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177; David McLellan, ed.,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77.
- ⑳ Karl Marx, "Poverty of Philosophy", in *Class, Power and Conflict: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ed. Anthony Giddens and David Hel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35-37.
- ㉑㉒ Karl Marx, *Capital*, vol. I, 761-64; 429.
- ㉓ 王振寰：《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轉型》(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1993)，頁166-67。
- ㉔ Robin Cohen, *Contested Domains: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Labour Studies* (London: Zed, 1991); Peter Waterman, *Globaliza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s* (London: Continuum, 2001).
- ㉕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LB, 1976); Robin Cohen, *Contested Domains*.
- ㉖ Antonio Gramsci, "Agitation and Propaganda", in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 and ed.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227-28.
- ㉗ 例如法國社會黨在1981年上台初期的國有化和勞工政策改革方案、英國托派組織「好戰傾向」(Militant Tendency)在工黨內部的鬥爭和1980年代的地方社會主義運動。
- ㉘ Simon Clarke, *Keynesianism, 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Aldershot, England: Edward Elgar, 1998).
- ㉙ Edward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63).
- ㉚ Eric Hobsbawm, *Worlds of Labour: Fur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4), 335-40.
- ㉛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207.
- ㉜ Michael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 ㉝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Verso, 1985).
- ㉞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80-93.
- ㉟ Simon Clarke, "The Neoliberal Theory of Society", in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ed. Alfredo Saad-Filho and David Johnst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50-59.
- ㊱ Jo McBride, "Mapping Worker Collectivism: Some Evidence from River Tyne Industries in the North East of England",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 no. 3 (2006): 583-91.
- ㊲ Marcel v. d. Linden and Lex H. v. Voss, eds., *Class and Other Identities: Gender,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the Writing of European Labour History*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2), 97.
- ㊳ David Knights and Hugh Willmott, "Power and Subjectivity at Work: From Degradation and Subjugation in Social Relations", *Sociology* 23, no. 4 (1989): 535-58; David Knights and Theodore Vurdubakis, "Foucault, Power, Resistance and All That", in *Resistance and Power in Organization*, ed. John M. Jermier, David Knights, and Walter R. Nord (London: Routledge, 1994), 167-98; David Knights and Hugh Willmott, eds., *Labour Process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90).

- ④⑩ Gareth S. Jones, *Language of Class: Studies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1832-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④⑪ Patrick Joyce, *Visions of the People: Industrial Eng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 1848-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④⑫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 Pluto, 1980).
- ④⑬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83-84.
- ④⑭ Ronaldo Munck, *The New International Labour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Zed, 1988).
- ④⑮ Robin Cohen, *Contested Domains*, 81-83.
- ④⑯ Beverly J. Silver,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
- ④⑰ 潘毅、陳敬慈：〈階級話語的消逝〉，《開放時代》，2008年第5期，頁53-60。
- ④⑱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④⑲ Chris K.-C. Chan and Elaine S.-I. Hui, "Bringing Class Struggles Back: A Marxian Analysis of the Stat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China", *Globalizations* 14, no. 2 (2017): 232-44.
- ④⑳ Chris K.-C. Chan and Elaine S.-I. Hui, "The Dynamics and Dilemma of Workplace Trade Union Reform in China: The Case of Honda Workers' Strike",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4, no. 5 (2012): 653-68.
- ④㉑ 參見 Beverly J. Silver, *Forces of Labor*; Kathrin Hille, "Foxconn Looks to a Robotic Future", *Financial Times*, 1 August 2011。
- ④㉒ 陳敬慈：〈勞工、資本與國家：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中國勞資衝突〉，《台灣社會學刊》，第50期（2012年9月），頁165-204。
- ④㉓ Anita Ch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NGOs and Chinese Workers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Global Labour Journal* 9, no. 1 (2018): 1-18.
- ④㉔ Joan M. Nelson, Charles Tilly, and Lee Walker, eds., *Transforming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c Press, 1999), 408-10.
- ④㉕ David C. Stark and Victor Nee,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State Socialism", in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ed. Victor Nee and David C. Stark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0.
- ④㉖ Stephan M.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3).
- ④㉗ Ching Kwan Lee and Yuen Shen, "The Anti-Solidarity Machine? Labou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n *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 ed. Sarosh Kuruvilla, Ching Kwan Lee, and Mary E. Gallagh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173-87; Anita Ch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NGOs and Chinese Workers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1-18.
- ④㉘ Hagen Koo,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